

青铜时代中期两河流域与北叙利亚地区国家间的交往

——以亚述王沙姆西阿达德统治时期为例

陈 艳 丽

鲁东大学 人文学院,山东 烟台 264039

摘要:青铜时代中期是西塞姆人成功统治新月沃地的时代,其中的阿摩利人在两河流域和北叙利亚地区建立了众多以阿摩利人为统治者的王国。在西亚政治局势愈加复杂和区域贸易愈加繁荣发展的形势下,这些国家在相互交往的过程中塑造了古代西亚地区国际交往活动的一个高峰期。基于地缘的原因,沙姆西阿达德统治的亚述王国是当时两河流域与北叙利亚地区各国交往最为密切的国家。亚述与北叙利亚地区各国在政治、军事、外交和贸易方面的冲突与合作,为考察青铜时代中期西亚地区的国际交往、地缘政治和区域贸易提供了多元视角。

关键词:青铜时代中期;两河流域;北叙利亚地区;沙姆西阿达德

中图分类号:K12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8039(2025)06-0001-11

青铜时代中期是西亚历史上的“阿摩利王国时期”。在这一时期,塞姆民族中的阿摩利人在从尼罗河三角洲、地中海东岸到波斯湾的广大地区都建立了统治政权,并形成了以几个主要国家为主导的“政治均势”^[1],为国家间的交往活动提供了有利的政治环境。同时,掌握在各国王室手中的区域贸易持续繁荣发展,各国间经济联系日益密切,贸易资源的获取成为影响国家外交决策的一个主要因素。在交往方式上,两河流域和北叙利亚地区^①^[2]⁵⁻⁸诸国承袭了青铜时代早期的惯例^②,将原本的外交实践复杂化和制度化,创造了古代西亚北非历史上国际交往活动的一个高峰期^[3]⁶⁸⁻¹¹⁰。

亚述国王沙姆西阿达德(Šamši-Adad I,约前1809—前1776年在位)是青铜时代中期首位伟大的阿摩利人征服者。历经数年征战,他建立起了一个横跨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的阿摩利人王

国——“亚述第一帝国”^[4]²²²⁻²²³,这是以一个主体民族为国民构成核心的区域性国家,并对后来亚述人的帝国意识形态产生了巨大的影响^[5]³⁶。公元前1793年对马瑞的占领,使亚述在地缘上成为两河流域与叙利亚地区联系最为紧密的国家。为了扩大亚述的政治影响力和提升国家经济发展的活力,沙姆西阿达德与北叙利亚地区各国在政治、军事、外交和贸易领域开展了积极的交往活动。

考古出土的有关沙姆西阿达德的楔形文字文献非常丰富,“在整个古代伊拉克的历史上,很少有能像沙姆西阿达德和他儿子们的统治时期那样被档案记录得那么详尽。而且,我们的信息并非来源于通常的官方铭文,而是来源于历史学家们所能期待的最准确和最可信的档案”^[6]¹⁹¹。与遗留下来的涉及沙姆西阿达德史料的丰富程度相比,学界对其研究则略显薄弱。现有成果着重研

收稿日期:2025-08-26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马瑞王室档案》与公元前两千纪早期西亚外交研究”(22BSS046)

作者简介:陈艳丽(1985—),女,黑龙江双鸭山人,历史学博士,鲁东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

①本文中的“叙利亚地区”指的是从幼发拉底河西岸到地中海东岸之间的广大地理区域,有别于今天的主权国家叙利亚,北叙利亚地区则指这一地理区域的北部,文中除特殊标明外,均为此意。关于“叙利亚”一词在历史时期的演变,参见 Trevor Bryce 的 *Ancient Syria: A Three Thousand Year Histor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4 年版。

②青铜时代早期,两河流域和北叙利亚地区少数城市王国的统治者们派遣使者携带礼物和外交信件前往他国宫廷,协商缔结和平条约和进行政治联姻,以此建立和巩固外交联盟。这一时期各王室主要从一些外国商人们的手中获得黄金、青金石、玛瑙、铜和锡等珍贵材料及制品,并以礼物、彩礼和嫁妆等形式进行交换。相关论述参见 Trevor Bryce 的 *Ancient Syria: A Three Thousand Year Histor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4 年版。

究了他的政治军事活动,主要论述了他在北方地区建立统一国家的过程和与同时期两河流域其他主要国家间的交往^[7];另有对其王权合法性的探讨^[8-9];鲜有将其统治时期的军事外交活动纳入西亚地区国家间交往的整体框架中去考察的^①。本文以出土王铭、外交书信档案和经济管理文献为据,对沙姆西阿达德统治时期亚述王国与北叙利亚地区各国交往的一般模式和具体表现进行梳理,为考察青铜时代中期西亚地区国家间交往和交往过程中形成的外交惯例和准则提供具体案例参考。

一、青铜时代中期两河流域和北叙利亚地区的政治经济形势

青铜时代中期西亚地区最为显著的政治特征是阿摩利人政权在两河流域和北叙利亚地区的广泛建立。阿摩利人最初由一些居住在叙利亚—巴勒斯坦地区^②^[6]²⁹的游牧民族组成。公元前24世纪左右的时候,部分阿摩利人因为干旱被迫到幼发拉底河对岸寻找新牧场^[2]¹⁷。随着阿摩利人在幼发拉底河河东地区人数的增加,这些向两河流域南部扩散的阿摩利群体对原有城邦和王国构成的威胁也越来越大。虽然阿卡德王朝(约前2371—前2193年)国王纳拉姆辛(Naram-Sin)最终击败了他们,但是阿摩利人的威胁仍持续存在,而在这一时期,他们在政治、经济和社会文化方面日益深入地融入了两河流域社会^[1]⁸⁵。之后他们不断向取代了阿卡德王朝的乌尔第三王朝(公元前2111—前2004年)施压。为了阻止阿摩利人持续深入的渗透,乌尔第三王朝的国王们建造了一连串横贯两河流域北部的防御工事或瞭望塔,但最终以失败告终^[10]⁷⁹。至公元前2004年,伊朗高原的埃兰人(Elamite)灭亡了乌尔第三王朝并撤走之后,那些早已完全城市化并在城市中拥有坚实权力基础的阿摩利部族最终在各个城市获得了统治地位,填补了埃兰人撤走后留下的权力真空,成为了这些以前属于阿卡德人和乌尔第三王朝的城市的统治者^[11]³⁰。这些城市包括马瑞(Mari)、拉尔萨(Larša)、巴比伦(Babylon)、基什(Kish)、马拉德(Marad)、西帕尔(Sippar)和埃卡拉图(Ekallatu)^③等。

在一部分阿摩利人向两河流域南部渗透之时,另一部分阿摩利人则进入了北叙利亚地区埃卜拉王国(Ebla)境内^[12]¹⁹⁻³⁶。埃卜拉是青铜时代

早期北叙利亚地区最强大的王国,政治和商业极为发达,其安全、繁荣和拥有先进文化的复杂社会环境,诱使这部分来到城市的传统游牧民放弃了原本的生活方式,转向了更为稳定的城市生活。埃卜拉王国被阿卡德王纳拉姆辛摧毁后,经历了短暂的城市王国复兴,最后在公元前2000年左右再次被摧毁^[13]¹⁻⁴⁴。早前进入该地区的阿摩利人顺势接管了最重要中心地区的政治统治,建立起了一系列阿摩利人国家:延哈德(Yamhad)、卡特那(Katna)、卡尔凯米什(Kar-Kemiš)、哈舒(Haššum)、乌尔苏(Uršum)、乌旮里特(Ugarit)^[14]、古卜拉(Gubla)^[15]¹¹¹等^[16]⁴⁴⁻⁴⁸。

阿摩利人在叙利亚地区建立的国家中,势力最为强大的是都城位于阿勒颇(Aleppo)的延哈德。从公元前19世纪开始,它在北叙利亚建立了历时200余年的“阿勒颇伟大王权”^[16]⁴⁹⁻⁶⁴,塑造了古代叙利亚历史上最为稳定的一个时期。在与沙姆西阿达德同时期的苏姆埃普赫(Sumu-Epuh?—前1781年)统治时期,延哈德的领土东达幼发拉底河,西达奥伦特斯河(Orontes),南方与卡特那毗邻,其北方的卡尔凯米什、哈舒和乌尔苏等国家虽未受其管辖却也深受其影响^[16]⁵⁰⁻⁵²。

乌尔第三王朝灭亡后,两河流域南部陷入了拉尔萨王朝(Larša,公元前2025年—前1763年)和伊辛王朝(Isin,公元前2020年—前1794年)200余年的争霸斗争之中,最终以拉尔萨国王瑞姆辛(Rim-Sin)攻陷伊辛城而告终。瑞姆辛的胜利发生在沙姆西阿达德占领马瑞前一年。而东方迪亚拉河地区的埃什依那也在其强大国王达杜沙(Daduša)的领导下积极扩展其政治影响,达杜沙在与瑞姆辛的通信中称呼对方为“我的兄弟”^④,这是两国间政治地位平等的表现^[7]¹⁶⁴⁻¹⁶⁶。这一时期,延哈德、卡特那、亚述、拉尔萨和埃什依那成

①兰金(J.M.Munn Rankin)在其试图构建公元前两千纪早期西亚外交整体框架的长文当中多处以沙姆西阿达德和其次子亚斯马赫阿杜的书信材料为文献证据,是少有的将其统治时期的军事外交活动纳入整个西亚地区国家间交往的整体框架中考察的研究。见J.M.Munn Rankin. *Diplomacy in Western Asia in the Early Second Millennium B.C.* Iraq, 1956(1)。

②叙利亚—巴勒斯坦一词指的是现代叙利亚、黎巴嫩、以色列、巴勒斯坦和约旦所覆盖的地区。这个复合名字并不是表示该地区是像两河流域或埃及一样作为一个单一的政治和文化统一体存在,相反,叙利亚和巴勒斯坦在文化上从未统一过,它是几种不同但又相互关联的文化的发源地。

③沙姆西阿达德家族占领的城市即为埃卡拉图。

④青铜时代西亚地区国家间的交往主要分为两种:一是政治地位平等的国家间的交往,统治者间互称“兄弟”;二是政治地位不平等的国家间的交往,双方统治者互称“父亲”和“儿子”,或是“主人”和“仆人”。

为两河流域和北叙利亚地区诸事务的主导力量,它们之间在政治、经济、军事和外交领域的冲突与合作构成了青铜时代中期西亚地区地缘政治的主要格局。

乌尔第三王朝崩溃和阿摩利人政权建立的另一重要影响体现为促成了两河流域贸易方向的根本转变。作为只适合饲养牛羊、种植大麦、椰枣和芝麻的土地,两河流域几乎没有森林和矿产资源。阿卡德王国的建立者萨尔贡(Sargon)曾在其铭文中宣称:“他使麦鲁哈(Meluhha)、马干(Magan)和狄勒蒙(Tilmun)的众船只停泊在阿卡德的码头。”^{[17]9-11}麦鲁哈是指古代印度河流域,森林、矿产、宝石、象牙等资源丰富^{[18]239};另一文献还提及麦鲁哈人给萨尔贡带来包括大象、猴子和水牛在内的来自外国土地上的礼物^{[19]102}。马干(即今阿曼)有大量的铜矿,是公元前三千纪时两河流域进口铜的主要来源地,该地还出产被两河流域国王们颇为珍视的用以制作雕像的黑色闪长岩^{[18]308}。狄勒蒙(即今巴林地区)除了珍珠外并没有太多的资源,但它是麦鲁哈和马干经波斯湾海路与两河流域进行长途贸易的重要中转站。两河流域人可以从狄勒蒙贸易市场上获取的商品有铜、象牙、锡、木材和容器等^{[20]441-448}。由此可见,至少在公元前三千纪的末期,经波斯湾海路与东方的贸易仍是两河流域主要贸易方向之一。

到了阿摩利王国时期,在两河流域政局剧烈变动的同时,因为战争或新民族的到来,辉煌的麦鲁哈文明已然崩溃,麦鲁哈诸城沦为废墟。在现存有关这一时期两河流域文献中,没有关于麦鲁哈的任何记载。马干的铜矿仍在大量开采,以满足整个西亚北非地区日益增长的需求,但是与乌尔第三王朝时期两地商人频繁贸易往来不同的是,阿摩利人统治时期两河流域和马干的直接接触变得很少了。这一转变是由于许多南部城市衰败,同时也是阿摩利人对这些城市的政治占领造成的,两流域的商业贸易范围从波斯湾地区转移到幼发拉底河以西、叙利亚北部以及更远的地区,原本从南部和东南部就很容易获得的材料不得不寻找到西部市场去寻找了^{[21]163}。

青铜时代中期西亚地区长途贸易持续发展和两河流域贸易中心的转移,凸显了北叙利亚地区对于两河流域来说至关重要的经济地位,因此造成了一批或是因为资源丰富,或是因为交通便利,或是二者兼而有之的城市的经济繁荣,而经济繁

荣又促成了其政治上的强盛,如马瑞、卡特那及延哈德。以延哈德王国为例,除了自身拥有丰富的资源,长途贸易亦是其经济发展命脉,其贸易网络从西方的塞浦路斯一直延伸到东部的埃兰。地处两河流域和黎凡特地区之间的延哈德充分利用陆路和内河贸易路线,成为东西方远距离贸易的重要中转站。来自塞浦路斯的货物在乌吉里特下船,经由陆路运往阿勒颇城,在阿勒颇进行交易之后,一部分商人携带货物回到乌吉里特,另一部分商人通过陆路到达幼发拉底河上游左岸地区的伊马尔城(Emar),在伊马尔城沿幼发拉底河航行到马瑞和南部各城市^{[22]96}。在区域贸易决定经济活力进而影响政治格局的背景之下,延哈德等国的外交政策也倾向于支持其长途贸易的发展,因为这一时期的长途贸易多掌握在各国王室手中,故而长途贸易的开展也构成了各个国家间交往的一部分。在这样的政治经济形势之下,对马瑞的军事征服与统治使亚述跻身于当时区域内主要政治势力之列,这成为沙姆西阿达德与北叙利亚地区各国频繁交往的重要原因。

二、沙姆西阿达德对马瑞王国的军事征服

马瑞位于叙利亚地区与两河流域的接壤处的幼发拉底河中游,是一座历史悠久的古老城邦^①。当沙姆西阿达德从身为阿摩利酋长的父亲那里继承埃卡拉图时,马瑞还被另一位阿摩利部落酋长之子亚赫顿林(Yahdun-Lim,约前1820—前1795年)统治着^{[10]103}。经过此前一系列军事征服活动,除王都马瑞外,亚赫顿林的统治范围还包括了幼发拉底河中上游地区和在两岸游牧的哈那人(Hana)活动区域。亚赫顿林统治期间曾在叙利亚北部地区进行了一次至地中海东岸的军事远征,他从黎巴嫩山脉带回了雪松、黄杨、柏树等珍贵的木材,迫使被征服地区的人们向其称臣纳贡,并在地中海东岸立碑为念^{[23]606-608}。亚赫顿林向地中海东岸的扩张行动造成了马瑞和延哈德关系的紧张,因为亚赫顿林的铭文记录了苏姆埃普赫挑动了前者治下6个地区的3位阿摩利酋长的反

^①在公元前3千纪中期,马瑞曾与埃卜拉争夺叙利亚北部地区的统治权,在很短的一段时间内迫使埃卜拉向其纳贡;阿卡德王朝时期,马瑞被萨尔贡(Sargon)征服,成为阿卡德王朝的附庸城市;在乌尔第三王朝时期,马瑞成为乌尔第三王朝的一个松散的附属国,之后在当地总督的统治下繁荣起来,后建立起阿摩利人的统治政权。

叛行动,亚赫顿林声称他击败了他的对手们^{[23]606-608}。有学者认为“在亚赫顿林统治期间,延哈德和马瑞之间的关系确实有所紧张。但在这一时期,这些王国从未真正发生过冲突”^{[2]20}。但是马瑞的附属城市伊马尔城的统治者阿比萨马尔(Abi-Samar)写给亚赫顿林的书信却表明,随着马瑞势力的扩张,它与以延哈德为首的北叙利亚诸国发生了直接的军事冲突:

我已经缔结了和平!因为【我没有】救星,我不得不缔结了和平。这个和平【不是】(真的)和平!……因为我没有了救星,我的那些没有被夺取过的诸城现在都被夺取了。在与哈舒、乌尔斯、卡尔凯米什和延哈德人的战争中,这些城市没有失去。但是,在与沙姆西阿达德的战争中,它们全都丢失了。现在,我已救了那些后面(尚存)的城市以及救了我自己的命。的确,你是(我的)保护者。诸城和你的臣民们的平安已变成了我的生命。^{[24]no.1}

亚赫顿林曾与迪亚拉河流域的埃什依那联合进攻了沙姆西阿达德,迫使他避难于南部的巴比伦。而阿比萨马尔此信的后半段内容则表明,在随后与马瑞的军事冲突中,沙姆西阿达德属于得利的一方,阿比萨马尔甚至恳请其主人亚赫顿林与沙姆西阿达德缔结和平条约^{[24]no.2}。不久之后,马瑞发生宫廷政变,亚赫顿林在政变中被其子苏姆亚蛮(Sumu-Yaman)取代。苏姆亚蛮统治马瑞两年(前1795—前1793年)后被下属官员谋杀,沙姆西阿达德则趁机迅速出兵占领了马瑞,并任命次子亚斯马赫阿杜(Yašmah-Addu)为总督对马瑞进行统治。

亚斯马赫阿杜在一篇给冥界主神涅普勒(Nergal)的祷文中描述了其家族从祖辈开始与亚赫顿林家族之间的纷争过往和亚述王国如何在神的授意下获得了马瑞的统治权的历程^{[24]no.3}。亚斯马赫阿杜此祷文旨在以“王权神授”的旗号宣告对马瑞统治的合法性,且沙姆西阿达德本人的铭文也多次宣称马瑞主神和保护神伊图尔美尔(Itur-Mer)将马瑞的全部国土和幼发拉底河岸的土地授予其进行统治^{[25]57-58}。亚斯马赫阿杜此祷文和沙姆西阿达德的铭文表明了古代西亚地区军事和外交活动中的“神圣规则”^{[3]70-74},世俗国王们的决策和行动被视为神明意志的体现,一位统

治者对另一位统治者的胜利则是神判的结果。

对马瑞王国的占领和统治(约前1792—前1775年),首先使沙姆西阿达德的统治范围从底格里斯河扩展至幼发拉底河,所以他在铭文中称自己为“使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之间土地平静之人”^{[25]59},其领土范围涵盖了两河流域的一半,从西帕尔(Sippar)北部到北方的哈兰(Harran)和恰昔尔·巴扎尔(Chagar Bazar),从西部的马瑞到东部的尼尼微(Nineveh)^{[26]33}。原马瑞控制之下的哈那游牧部落此时也尽归亚述王国所有,亚斯马赫阿杜多次对这些部落进行人口普查,其目的是征兵、收税和分配土地^{[24]no.6,20,42}。善战的哈那游牧部落遂成为亚述军队的重要兵役来源。沙姆西阿达德在一封给亚斯马赫阿杜的信中让其对哈那各部下令:“国王将远征,所有男人包括少年必须全部参加。没有召集他全部士兵的酋长,哪怕仅留下一个人,都将触犯国王的忌讳!”^{[24]no.6}

此外,马瑞历来是交通和战略要地。青铜时代中期,随着两河流域商业贸易中心西移,幼发拉底河成为承载这一时期区域贸易的重要角色。位于幼发拉底河中游位置的马瑞成为一个水路交通枢纽,船只可以沿河顺流而下到达两河流域中部和南部各大城市,然后进入波斯湾。公元前1800年左右,两河流域还开通了前往地中海的沙漠贸易路线,马瑞和卡特那分别位于这一贸易路线的东西两端,这又使得马瑞成为两河流域通往地中海东岸的陆路交通要地。马瑞所处的水陆交通枢纽的位置对于贸易活动和军事活动而言都极具战略价值。

由于本土矿产资源的缺乏,过境贸易的充分发展是这一时期两河流域贸易繁荣和保持经济活力的重要方式。位于水陆交通枢纽的马瑞则成为了区域贸易重镇,其统治者得以从过境贸易中获取大批财富。青铜时代中期两河流域最重要的进口资源是铜,此时塞浦路斯(Cyprus)塔格塔山(Tagata)铜矿产出的铜是两河流域重要铜源之一,马瑞出土文献记载了塞浦路斯铜流入马瑞的实例^{[21]169},塞浦路斯铜经由北叙利亚地区到达马瑞,再经由马瑞到达两河流域其他地方。青铜冶炼需要的另一种原料是当时更为珍稀的金属锡,这个时代两河流域商人只能从东方伊朗高原的埃兰进口这一金属^{[27]129}。马瑞文献记载了一条从东方经由马瑞到西方塞浦路斯和克里特的锡贸易

路线。例如,一篇马瑞文献记录两个埃兰人运送了大约 100 公斤锡到马瑞,而其中大部分被送到了阿勒颇^{[28] no.233};类似的货物还从马瑞经水路运往卡尔凯米什^{[28] no.86}、卡特那^{[28] no.87,88} 和哈卓尔 (Hazaor)^{[28] no.236}。据此可以判断,马瑞商人们大量购买来自东方的锡,然后分销至阿勒颇、卡尔凯米什、卡特那、乌督瑞特和哈卓尔等地,再经由乌督瑞特向西运至塞浦路斯和克里特。

从政治、军事和商业角度来看,马瑞在沙姆西阿达德王国中扮演了重要角色。水陆交通枢纽的地理优势使马瑞成为过境贸易重镇,同时还可以向过境的南北商船征收过境税 (miksum)^{[24] no.66},这使得马瑞成为青铜时代中期西亚地区一座繁荣和富庶的城市,对马瑞遗址的考古发掘也证实了这一点。马瑞富裕的名声直达地中海东岸,位于地中海东岸的乌督里特国王就曾请延哈德国王代为转达了其想参观马瑞王宫的愿望。对马瑞的占领和统治,使沙姆西阿达德的势力范围横跨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在地缘上成为与叙利亚地区联系最为紧密的国家;他还从马瑞获得了兵源,获得了财富,获得了继续西进的战略据点。

三、沙姆西阿达德与卡特那王国的平等交往

卡特那位于盛产谷物的霍姆斯平原 (Homs Plain) 中心地区,是青铜时代中期北叙利亚地区仅次于延哈德王国的势力。延哈德和卡特那由于分属不同的阿摩利部落团体,自有文献记载的历史早期开始,它们就是敌对关系,延哈德不时劫掠卡特那的村庄或牧场^{[29] 167-170}。沙姆西阿达德最初与延哈德国王苏姆埃普赫保持着友好关系,但是在征服马瑞之后,亚述在幼发拉底河地区的影响力日益扩大,沙姆西阿达德便开始谋求与卡特那的友好关系,以获得不需要经延哈德控制范围而到达地中海的通道,亚述遂与延哈德转为敌对关系^{[2] 20}。而当时的卡特那国王伊什希阿杜 (Ishi-Addu? —前 1775 年) 也迫切需要一个强有力的盟友助其抗衡来自延哈德的压力。故而,亚述与卡特那之间建立起了表现为“兄弟”^{[3] 74-84}关系的政治外交联盟,而两国之间的交往是该时期西亚地区政治地位平等的大国间交往的典型代表。

首先,沙姆西阿达德统治马瑞的儿子亚斯马赫阿杜与伊什希阿杜之女贝勒图姆 (Beltum) 的政

治联姻是双方盟友关系建立的基础。在与贝勒图姆联姻之前,亚斯马赫阿杜已经娶了亚赫顿林的女儿为妻,随着马瑞被征服,他与前马瑞公主的婚姻对沙姆西阿达德而言已没有任何政治上的益处,所以他又被安排了与卡特那公主的联姻^{[10] 109}。在一封写给伊什希阿杜的信中,沙姆西阿达德说:

对伊什希阿杜说! 你的兄弟沙姆西阿达德的话如下:当我听说你在安全的旅程中送来我所喜欢的儿媳 (*kallati*), 我的(相关)人员在你面前待了 4 天且你令他们满意,我的儿媳和人们正高兴地前往马瑞时,我非常高兴。关于在你心里的全部事情,你写给我,你说:“(延哈德的) 苏姆埃普赫不断地袭击我”。让他袭击 1 个月或 2 个月,直到这一目标完成。这没什么。让你与他接壤的土地(上的人们)聚集到堡垒中!^{[24] no.24}

此信进一步确认了延哈德与卡特那间的敌对关系,而在沙姆西阿达德看来,两国间政治联姻能否顺利完成与两国结成反苏姆埃普赫的联盟是紧密相关的。一封沙姆西阿达德写给亚斯马赫阿杜的书信,记录了此前两国协商聘礼 (*terhātum*) 和嫁妆 (*nidintam*)^{[30] 53-74} 的数量:“我将为你聘娶伊什希阿杜的女儿为妻。因为马瑞家族有巨大的名声,卡特那家族也有巨大的名声,所以,较少的聘礼将羞于给出。5 塔兰特 (talent)^① 银子作为聘礼将被送给卡特那”^{[24] no.77};后来经双方协商,聘礼的数量有所变化,嫁妆的数量也固定下来:“4 塔兰特银子作为伊什希阿杜女儿的聘礼将被给出……伊什希阿杜知道这一决定。作为对他女儿聘礼 4 塔兰特银子的回馈,他将给出 10 塔兰特银子的嫁妆,包括价值 5 塔兰特银的织物。我将取走嫁妆中的全部织物,你不要自己拿走它们”^{[24] no.46}。在古代西亚北非外交活动中,嫁妆和聘礼从本质上来说也是一种借王室联姻而实行的贸易行为^{[31] 32},沙姆西阿达德的书信亦可佐证这一观点。

其次,亚述与卡特那结盟的最直接后果是亚述卷入到了卡特那与延哈德的冲突之中。沙姆西阿达德在同一封信中曾承诺伊什希阿杜,当双方政治联姻顺利完成后,他将派遣军队到卡特那帮

①古代两河流域重量单位,1 塔兰特约等于 60 斤。

助其对抗苏姆埃普赫：“之前，我写给我的兄弟，说：‘当这一目标实现后，如果你希望指挥（命令），我将派遣一位将军和我的军队给你！如果你希望指挥，让一个马瑞贵族到你处！如果你希望指挥，我自己将到你处！’之前我写那些话给我的兄弟。现在，我的兄弟要求我去。因为我的兄弟要求我去，当这一目标实现后，我将和我的军队一起去我的兄弟处，我将达成我兄弟的目标。现在，我写给辛提瑞(Sin-tiri)，让他集合他所有的哈那人，他将以主力劫掠苏姆埃普赫的牛群和腊巴伊城(Rabbayi)的人”^{[24] no.24}。由此信可知，沙姆西阿达德令其统治下的哈那游牧部落去劫掠苏姆埃普赫的牛群以分散其注意力，从而减轻伊什希阿杜的压力。

沙姆西阿达德对卡特那的军事援助是非常积极的，他经常写信督促和指挥亚斯马赫阿杜派兵前往卡特那事宜，派遣军队人数从几百、上千和上万不等^{[24] no.23, 42}，目前文献中可见最大人数为21000人^{[24] no.42}。其构成如下：牧场上的哈那人2000人，两个苏胡(Suhu)部落中集合1000人，席马依城的哈那游牧人中集合1000人，其他游牧部落和亚斯马赫阿杜的侍从集合1000人，亚述军团10000人，埃什依那军队6000人。沙姆西阿达德自己也说：“这是一支强大的军队，没有人能和他们战斗，他们将前往卡特那。”^{[24] no.42}

沙姆西阿达德、亚斯马赫阿杜和伊什希阿杜之间的多封往来书信还表明亚述在卡特那驻有军队^{[24] no.11, 13, 20, 23, 69, 85, 115}。亚斯马赫阿杜在一封信中要求伊什希阿杜允许一支在卡特那驻扎了4年之久的亚述军队进行休整^{[32] no.19}。长久在异国驻军会导致军队的不满。沙姆西阿达德也提出过亚述在卡特那驻军的换防问题：“你千万不要说，从卡特那回来的军队十分疲劳，他们怎么能驻守要塞呢？他们应该换防。让他们互相轮换！让一个军团驻守一个月！然后让他们撤出！让另一个军团替换他们！让他们这样轮换，他们就不会抱怨了。”^{[24] no.20}

伊什希阿杜在一封信中要求亚斯马赫阿杜本人和军队一起来卡特那，并将自己嫁到马瑞的女儿带回来，他还承诺会给对方很多赠礼：“我连续多日给你的军队写信，然后你的军队一直回答我，‘是的，军队即将到来’。然而，军队并没有到来。现在，我重新以神的名义起誓：除非我亲眼所见，否则我不相信任何军队会来。现在，你应该亲自

和军队一起来。带我的女儿和你一起来，她能使她城市的诸神高兴。我将会给她许多礼物。让她见我，我将使她荣耀”^{[33] no.51}。伊什希阿杜的另一封信揭示了他要求亚斯马赫阿杜率军前来的意图是联合占领三座城市并瓜分战利品：“关于你前来的决定，你不要偷懒。现在正是适合你前来的季节。让你的军队享受战利品，这样他们就会为你祈祷。这三座城市是不设防的。我们可以一天就攻占它们。立即到我这里来，让我们占领这些城市，让你的军队享受战利品！”^{[32] no.16}

此外，除政治联姻和军事合作外，以外交书信为媒介的信息交换、具有贸易性质的外交礼物互赠和统治者间的互访也是青铜时代中期西亚地区国家间交往的主要方式，而具体承担这些职责的各等级使节们则在各个国家间穿梭往来^{[34] 97-100}。亚述和马瑞与卡特那之间的书信往来非常频繁，而且根据传递消息的急缓，书信往来的速度也各不相同，如：“对亚斯马赫阿杜说！你的父亲沙姆西阿达德的话如下：与此信同时，我寄给你一封写给伊什希阿杜的加急泥板文书。你要立刻使人把泥板文书送给伊什希阿杜！”^{[24] no.48, 49, 84, 105}。苏姆埃普赫曾宣称他击败了沙姆西阿达德并劫掠了他的国家，“苏姆埃普赫不断派遣努孜(Nuzi)人和信使们到全部国家，说：‘我集合了图如库人，且派遣军队进入图如库。我击败了沙姆西阿达德并劫掠了他的土地’。他不断散布这一消息”^{[29] 169}。当伊什希阿杜得知这一消息时，他迫切地希望得到来自亚述的消息，“当我听到这一消息的那天，我的心非常担忧。另外，已经很多天没有一个你的使节到来了。一来我心里根本不相信这些消息，二来因为没有你的使节来我处，我又有点相信这些消息。……现在，苏姆埃普赫切断了我的使节们的路线和你的使节们的路线，所以我相信了这些话。……无论如何，无论苏姆埃普赫所说事情是真是假，立即写信给我！让我知道此事，让我得到消息！”^{[32] no.17}

马瑞出土文献记载的亚述和卡特那两国王室之间往来交换的物品主要有货运车辆及相应装备、马匹、葡萄酒、各种容器和珠宝等。沙姆西阿达德的一封书信表明他本人派出了一支前往卡特那的商队，他在信中要求管理马瑞的亚斯马赫阿杜不要对他的过路商队征税，而且要给其治下的泰尔喀城(Terqa)写信，令该城为其商队准备从泰尔喀城到卡特那的旅程物资^{[24] 66}。泰尔喀城位于

马瑞上游的幼发拉底河左岸,基本与卡特那处于同一纬度,根据沙姆西阿达德此信可知从泰尔喀出发西行,约10天的沙漠行程可到达卡特那。

政治联姻和盟友关系的建立,也使得卡特那和亚述放松了对彼此边界的管控。双方应该有过关于允许马瑞牧人在干旱时到卡特那境内牧场上放牧的约定。伊什希阿杜在一封给亚斯马赫阿杜的信中说:“你一写信给我,我就注意了你的话。你的羊群和牧人们要从这里过去,这样我的羊就可以和你的羊群一起吃草。这里牧草很丰盛。派你的酋长们到我这里来;我将会给他们指令,把你们的羊群交托给他们。我的羊群将和你的羊群一起吃草。”^{[32] no.15}

除了拥有良好的牧场外,作为当时叙利亚地区第二大政治势力的卡特那还具有十分重要的战略地位,它处于公元前两千纪西亚地区三条重要商贸路线的节点位置^{[2]20}。首先,前文曾提及卡特那和马瑞分别位于两河流域前往地中海东岸的沙漠贸易路线的西、东两端^{[29]162},从巴比伦尼亚沿幼发拉底河上行,到达马瑞,穿过帕勒米拉(Palmyra)荒原,经由卡特那,穿过一座山隘即可到达地中海东岸盛产木材的毕布罗斯。而黎巴嫩山脉著名的雪松林也位于卡特那境内,可以说卡特那在木材供给方面处于垄断地位。青铜时代中期,随着马的驯养、车轮和战车的知识在西亚地区的传播,各国对马匹的需求也大大增加,而卡特那则盛产良马。经由卡特那和马瑞贸易路线,叙利亚地区的木材、马匹被运送到幼发拉底河边,然后又从那里被运至两河流域的北方和南方。而来自安纳托利亚和伊朗高原的金属资源经马瑞和卡特那可进入叙利亚和黎凡特,西至爱琴地区。其次,从地中海东岸的乌昔瑞特和毕布罗斯港口,经由卡特那东行到达幼发拉底河边的伊马尔城,便可沿幼发拉底河水路南下到达马瑞和南部各城。卡特那则成为塞浦路斯和黎凡特出产和制造的铜、容器、织物和服装运往两河流域的转口港^{[35]12}。最后,卡特那位于安纳托利亚与埃及南北路线的中间位置,埃及的货物流入卡特那,向北进入安纳托利亚,向东进入两河流域^{[12]76-77}。

沙姆西阿达德与卡特那盟友关系的建立,既服务于双方共同对抗延哈德王国的政治需求,也使从两河流域到叙利亚的沙漠贸易路线牢牢掌握在两个同盟国手中。由此保证了经由马瑞—卡特那贸易路线的安纳托利亚和伊朗高原与叙利亚、

黎凡特和爱琴地区的贸易往来;同时也使亚述有了一条不经由延哈德势力范围即可到达地中海的通路,进而保证地中海海岸地区的资源经卡特那、沙漠贸易路线、幼发拉底河而顺利进入亚述境内,从而保证了王国的经济活力。

四、沙姆西阿达德与卡尔凯米什等国的不平等交往

与卡特那、延哈德这种地区内主要政治势力不同,同为阿摩利人在北叙利亚地区建立的卡尔凯米什、哈舒和乌尔苏,在青铜时代中期的地缘政治格局中处于次一级的势力范畴。当马瑞还在亚赫顿林统治之下时,由于他强势地向北叙利亚和地中海岸扩张其势力,卡尔凯米什、哈舒和乌尔苏等国曾与延哈德结成了反亚赫顿林的联盟。之后,随着延哈德势力的不断增长,北叙利亚地区其余国家都承受着越来越多来自延哈德的政治和军事压力。为了自身安全和利益,当沙姆西阿达德占领马瑞并公开与延哈德敌对之后,这几个国家转而与沙姆西阿达德结成了对抗延哈德的联盟。沙姆西阿达德在给卡特那国王伊什希阿杜的关于对抗苏姆埃普赫的信证实了这一联盟关系的存在:

之前,我召集了哈舒城的统治者、乌尔苏城的统治者和卡尔凯米什城的统治者。我对他们说:“我将亲自检查苏姆埃普赫的事情,如果他是一个敌人,让我们一起战斗!”这是我在前一封信中写给你的。现在,因为我听到了我兄弟的信,我的……,哈舒城的统治者、乌尔苏城的统治者和卡尔凯米什城的统治者,他们将是苏姆埃普赫的敌人们。他们将拒绝和他结盟。哈舒城的统治者已经将他的军队派遣到我处,他们在我身边服务。乌尔苏城的统治者要我派遣1000人的军队,我将给他2000人的军队。我将使他们集合并开拔,他们将使苏姆埃普赫屈服,他们将转移他对你的压力。^{[24] no.24}

由于目前尚未有卡尔凯米什、哈舒和乌尔苏等国统治者与沙姆西阿达德的直接通信,故而未有明确的“兄弟”或“父子/主仆”术语来昭示联盟双方的地位问题。但是,卡尔凯米什国王阿坡拉韩达(Aplahanda)在与统治马瑞的亚斯马赫阿杜

的通信中称呼对方为“我的兄弟”^{[32]no.13}，而亚斯马赫阿杜为沙姆西阿达德之子，基于此可判断卡尔凯米什等国是将自己放在了与马瑞对等的亚述从属位置，双方建立的是基于“父子/主仆”关系之上的不平等盟友关系。上述沙姆西阿达德书信的内容也可以证明亚述在该联盟内的领导地位。

沙姆西阿达德此信也反映了在当时的政治外交联盟内，领导力量与其附庸力量之间的关系问题。首先，附庸国的外交政策要追随其领导国的外交政策，被禁止与领导国的敌对国家建立外交关系^{[33]no.41}，如沙姆西阿达德信中所说哈舒、乌尔苏和卡尔凯米什的统治者将是苏姆埃普赫的敌人，他们不会和他结盟。其次，联盟内所有成员国在防御和进攻战役中要彼此合作^{[33]no.68, [36]no.33}，如沙姆西阿达德信中所讲哈舒、乌尔苏和亚述的军队将共同与延哈德作战。还有就是成员国每年都要向领导国表示敬意和缴纳贡品^{[33]no.119}。

除了为共同抗衡延哈德王国的政治和军事合作之外，亚述与卡尔凯米什、哈舒和乌尔苏等国家间还经常进行“礼物”交换以巩固联盟关系。沙姆西阿达德经常派使者向卡尔凯米什、乌尔苏、哈舒的统治者送去各种“礼物”^{[37]96}。卡尔凯米什国王阿坡拉韩达与亚斯马赫阿杜的联系非常频繁，阿坡拉韩达热衷于满足亚斯马赫阿杜的各项要求，他经常给亚斯马赫阿杜送去各种礼物，如“对亚斯马赫阿杜说，你的兄弟阿坡拉韩达的话如下：50 罐我自己饮用级别的葡萄酒，50 罐蜂蜜 (lāl)，一匹颜色鲜艳的亚麻布 (gad-hi-ri ša gùn-a)，5 钧用于研磨的石头，交到伊比阿杜和亚维伊拉手中，我将派人给你送去”^{[32]no.13}。葡萄酒是备受各国王室和贵族喜爱的一种饮品，卡尔凯米什是西亚地区著名的葡萄酒产地，所以葡萄酒成为其统治者对外贸易和交往的一种重要物资^{[32]no.9; [28]no.238, 257; [38]no.514-521, 536-539}。该地生产的葡萄酒经幼发拉底河顺流而下可到达马瑞、西帕尔和巴比伦等地，而葡萄酒的市场价格也是随市场供需关系的变化而变化。蜂蜜在当时是比较珍稀的一种甜味剂^①，所以亚斯马赫阿杜对阿坡拉韩达的“赠与”十分感激^{[21]173-174}。

从卡尔凯米什运到马瑞的物品除了北叙利亚地区盛产的谷物、葡萄酒、蜂蜜和橄榄油以外，还有来自安纳托利亚的马匹和来自克里特的 (kaptarītum) 容器等^{[38]no.533}。青铜时代中期，两河流域的铜原料一是来自上文提及的塞浦路斯塔格

塔山的铜矿，另一来源则位于幼发拉底河上游附近的群山之中。阿坡拉韩达曾在一封给亚斯马赫阿杜的信中说：“现在，在卡尔凯米什附近的兹腊努地区 (Zirānum) 有铜矿，它的产量是丰富的。安排你的仆人为警卫为你看着它。”^{[32]no.6}此信表明阿坡拉韩达将在其势力范围内某处发现的铜矿送给了亚斯马赫阿杜。另一文献中所记载的“购买 7 塔兰特的‘山区铜’”^{[28]no.135}也大致产于这一地区^{[27]121-123}。

纺织品和锡是当时亚述出口到安纳托利亚高原的主要商品。古亚述时期的文献也描述了一条从东方某处经由亚述领土到安纳托利亚卡尼什附近的锡贸易路线。著名的古亚述商人沙里姆阿淑尔 (Šalimu-Aššur) 家族组织的一次由 34 头驮驴组成的商队运往安纳托利亚的货物如下：603 件 kutānu 纺织品，其中 100 件为二等品；35 件上好的 kutānu 纺织品，其中 3 件由伊里维达库封印；64 件阿巴尔尼 (abarnian) 纺织品；20 塔兰特加印的锡 (600 公斤)，加上零散锡；34 头驴子和它们的挽具；12 件纺织品；1 塔兰特碎金属；600 颗钉子；25 升油，12.5 升一级油；22 舍克勒红宝石；100 颗宝石；青铜别针；方木料；60 升藏红花；30 磅的雪松香^{[39]214-215}。有学者对近 200 件卡尼什出土文献进行了数据统计，仅这些文献中记载的从阿淑尔城运送到卡尼什城的货物量就有 14500 件纺织品和 27000 磅锡^{[40]79}。沙姆西阿达德时期，亚述商人继续进行着与安纳托利亚的贸易活动，马瑞出土的文献记载了一支由 300 个亚述人和 300 头驮驴组成的经由北部丘陵地区前往卡尼什的商队^{[41]no.432-433}，“这 300 头驴组成的商队即便仅仅是指每年一次的商队(没有任何证据表明这一结论)，表明在这一时期亚述和安纳托利亚之间依然存在着大量的进口贸易”^{[39]89}。

进行长途贸易的亚述商人们面临的危险来自恶劣的旅途环境、沿途的盗窃和抢劫，但更大的风险来自途经地和贸易地的动荡与冲突。卡尔凯米什坐落在阿勒颇以北的幼发拉底河西岸，它是两河流域与安纳托利亚高原长途贸易的一个重要中转站。哈舒城位于阿马努斯 (Amanus) 山脉东侧的马腊苏 (Marasu) 河谷中，它扼守着从叙利亚和

①因为养蜂业似乎直到亚述帝国时期才出现在两河流域，所以马瑞一般从北叙利亚各地进口这种产品，一个来自库勒泰普 (Kültepe) 的古亚述文献表明乌尔苏是一个特别的蜂蜜产区。但是能进口到马瑞的蜂蜜的数量是极少的。

两河北方进出安纳托利亚高原的重要路线^{[42]209-210}。乌尔苏是叙利亚东北部的一个中心,大致位于卡尔凯米什以北,幼发拉底河右岸^{[33]131},乌尔苏的“商港”(*karnum*)和阿淑尔神庙是亚述和安纳托利亚长途贸易的重要中转站,叙利亚地区的商人也经由此两地进行着他们与安纳托利亚诸国的商业活动,主要贸易品为安纳托利亚盛产的铜^{[16]40-42,74}。亚述与卡尔凯米什、哈舒和乌尔苏友好盟友关系的建立为亚述商人在北方地区的长途贸易创造了稳定的政治和经济环境。可以说,亚述与卡尔凯米什、哈舒和乌尔苏的盟友关系的建立,既服务于共同抗衡延哈德的政治需求,又服务于亚述在安纳托利亚地区的经济利益。

在与亚述的长期政治博弈中,苏姆埃普赫的继任者亚荏林首先庇护了在亚赫顿林统治时期马瑞宫廷政变之际流亡到阿勒颇的马瑞王子金瑞林,并将其女儿西卜图(*Šibtu*)嫁与金瑞林达成了政治联姻关系^{[10]98}。然后,延哈德与亚述东面曾被其挫败的埃什依那和东南部的巴比伦结成了强大的联盟,形成了东、南、西三个方向对亚述的包围,约在公元前1776年在战场上击败并杀死了沙姆西阿达德^{[43]308}。同时,亚荏林迅速出兵支持金瑞林重新夺取了其家族对马瑞的统治权,并在沙姆西阿达德去世4年后将亚斯马赫阿杜赶出了马瑞。

金瑞林驱逐亚斯马赫阿杜的战斗显然得到了亚述前盟友乌尔苏的支持^{[33]no.131}。亚斯马赫阿杜曾经的“兄弟”卡尔凯米什王阿坡拉韩达也与马瑞新王金瑞林结成了基于“兄弟”关系的盟友关系。马瑞的经济管理文献表明哈舒、乌尔苏和卡尔凯米什均与金瑞林有密切的经济往来,建立了良好的外交关系。卡尔凯米什、哈舒和乌尔苏先与延哈德联合对抗亚赫顿林统治时期的马瑞;在马瑞被亚述征服之后,它们转而与沙姆西阿达德结盟对抗延哈德;当沙姆西阿达德战败去世后,再转而支持金瑞林和延哈德推翻亚斯马赫阿杜在马瑞的统治。由此可见,在青铜时代中期西亚地区的国际交往中,随着政治局势的变动,国家间的联盟也随之不断变动,各小国以种种方式在主要的政治势力间左右横跳以谋求生存。

在青铜时代中期的两河流域和北叙利亚地区,延哈德、卡特那、亚述等几个主要国家构建起

了以其为主导的“政治均势”,创造了有利于国际交往的政治环境;而卡尔凯米什、哈舒、乌尔苏等小王国则为地区内次一级甚至更次一级的政治力量,在政治、军事和外交方面追随其所依附的领导势力。亚述与卡特那间建立的“兄弟”关系联盟,亚述与卡尔凯米什、哈舒和乌尔苏建立的“父子”或“主仆”关系的联盟,是基于不同国家所处的政治地位而建立起来的政治外交联盟的两种类型。至青铜时代中期,西亚已然形成了一张遍及小亚、两河流域、伊朗高原、叙利亚地区和东地中海且远及克里特的贸易网络。天青石、锡、铜、金银及金银制品、宝石、雪松和黄杨等木材、马匹、葡萄酒、蜂蜜等珍稀物资的贸易多掌握在各城市或各国的王室手中,因而这些王国和城市也积极采取各种手段服务于其对外贸易的发展,各国间建立起了紧密的经济联系。因此,西亚地区资源分布的不均衡性成为影响其国家交往的经济动因,区域贸易亦构成国家间交往活动的一项主要内容。

综观沙姆西阿德与延哈德、卡特那、卡尔凯米什、哈舒和乌尔苏等大小国家间的交往活动,虽然小规模的军事冲突不可避免,但是,以外交和贸易为主的和平交往是这一时期两河流域和北叙利亚地区国家间交往的主流。沙姆西阿德与各国统治者间的政治联姻、军事合作、信息交换、外交礼物互赠和对他国的访问反映了国家间交往的几种主要方式。肇始于青铜时代早期的国家间交往的实践、惯例和准则,经由青铜时代中期两河流域和叙利亚地区各国进一步实践和发展,形成了各国普遍遵守的国际交往礼仪。此后,西亚北非地区经历了频繁的民族迁徙和严重的民族冲突,经历了一段政治秩序重构时期。新的统治秩序建立之后,公元前16至前14世纪西亚北非地区的“大国外交”亦基本遵循了青铜时代中期形成的国际交往礼仪,并在此基础上发展出了新的特点。可见,青铜时代中期是古代西亚北非国际交往史上承上启下的关键时期。

参考文献:

- [1] Burke A A. *The Amorites and the Bronze Age Near East* [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21.
- [2] Bryce T. *Ancient Syria: A Three Thousand Year History* [M].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4.
- [3] Munn Rankin J M. *Diplomacy in Western Asia in the Early Second Millennium B C* [J]. *Iraq*, 1956(1).

- [4] 刘文鹏,吴宇虹,李铁匠.古代西亚北非文明[M].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08.
- [5] Pitard W T. Before Israel: Syria-Palestine in the Bronze Age[C]// Michael Coogan. The Oxford History of the Biblical World.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1.
- [6] Roux G. Ancient Iraq [M]. London: Penguin Group, 1992.
- [7] Wu Yuhong. A Political History of Eshunna, Mari and Assyria during the Early Old Babylonian Period (From the end of Ur III to the death of Šamši-Adad) [M]. Changchun: the Institute of History of Ancient Civilizations Northeast Normal University, 1994.
- [8] Wu Yuhong. Did Assyrian Kinglist Attempt to Prove the Legitimacy of Šamši-Adad I? [J]. Journal of Ancient Civilizations, 1990.
- [9] 陈飞.《亚述王表》与亚述王权[J].世界历史, 2019(1).
- [10] van de Mieroop M. A History of the Ancient Near East: ca. 3000–323 BCE [M]. London: Blackwell, 2007.
- [11] Gelb I J. The Early History of the West Semitic Peoples [J]. Journal of Cuneiform Studies, 1961(1).
- [12] Amanda H. Podany. Brotherhood of Kings, How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Shaped the Ancient Near East [M].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0.
- [13] Archi A, Biga M G. A Victory over Mari and the Fall of Ebla [J]. Journal of Cuneiform Studies, 2003.
- [14] Buck M G. The Amorite Dynasty of Ugarit [M]. Leiden and Boston: Brill, 2020.
- [15] Dossin G. Les archives économiques du Palais de Mari [J]. Syria, 1939(2).
- [16] Klengel H. Syria, 3000 to 300 BC, A Handbook of Political History [M]. Berlin: Akademie Verlag GmbH, 1992.
- [17] Frayne D. The Royal Inscriptions of Mesopotamia Early Periods Volume 2: Sargonic and Gutian Periods (2334–2113 BC) [M]. Toronto: 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 1993.
- [18] Aruz J. Art of the first cities: The Third Millennium B C from the Mediterranean to the Indus [M]. New Haven and London: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03.
- [19] Sallaberger W, Westenholz A. Mesopotamien: Akka-deZeit und Ur III-Zeit [M]. Freiburg: Universitätsverlag Freiburg, 1999.
- [20] Eidem J, Hojlund F. Trade or Diplomacy? Assyria and Dilmun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 BC [J]. World Archaeology, 1993.
- [21] Sasson J M. A Sketch of North Syrian Economic Relations in the Middle Bronze Age [J]. Journal of the Economic and Social History of the Orient, 1966.
- [22] Redford D B. Egypt Canaan and Israel in Ancient Times [M].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2.
- [23] Frayne D. The Royal Inscriptions of Mesopotamia Early Periods Volume 4: Old Babylonian Period (2003–1595 BC) [M]. Toronto: 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 1990.
- [24] Dossin G. Archives Royales de Mari I: Correspondance de Šamši-Addu [M]. Paris: A la Librairie Orientaliste Paul Geuthner, 1950.
- [25] Grayson A K. The Royal Inscriptions of Mesopotamia Assyrian Periods Volume 1: Assyrian Rulers of the Third and Second Millennia BC (to 1115 BC) [M]. Toronto: 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 2002.
- [26] Haywood J. The Penguin Historical Atlas of Ancient Civilizations [M]. London: Penguin, 2005.
- [27] Leemans W F. The Trade Relations of Babylonia and the Question of Relations with Egypt in the Old Babylonian Period [J]. Journal of the Economic and Social History of the Orient, 1960.
- [28] Bottéro J. Archives Royales de Mari VII: Textes Économiques et Administratifs [M]. Paris: A la Librairie Orientaliste Paul Geuthner, 1957.
- [29] Durand J-M. Documents pour l’Histoire du Royaume de Haute-Mesopotamie I [J]. Mari Annales Recherches Interdisciplinaires 5, 1987.
- [30] Dalley S. Old Babylonian Dowries [J]. Iraq, 1980.
- [31] 袁指挥.阿马尔那泥板书信中所见的古代西亚北非大国外交方式[J].古代文明, 2008(3).
- [32] Dossin G. Archives Royales de Mari V: Correspondance de Yašmah-Addu [M]. Paris: A la Librairie Orientaliste Paul Geuthner, 1952.
- [33] Jean C-F. Archives Royales de Mari II: Lettres Diverses [M]. Paris: A la Librairie Orientaliste Paul Geuthner, 1950.
- [34] 陈艳丽,王志强.论青铜时代中期西亚国家间的外交关系[J].中东研究, 2024(1).
- [35] Malamat A. Mari [J]. Biblical Archaeologist, 1971 (1).
- [36] Kupper J R. Archives Royales de Mari VI: Correspondance de Bahdi-Lim [M]. Paris: A la Librairie Orientaliste Paul Geuthner, 1977.
- [37] Charpin D. Nouveaux documents du bureau de l’huile à l’époque Assirienne [J]. Mari Annales Recherches Interdisciplinaires 3, 1984.
- [38] Charpin D, Francis J, Sylvie L. et al. Archives Royales de Mari XXVI: Archives Épistolaires de Mari I/2 [M]. Paris: Edition Recherche sur les Civilisations, 1988.
- [39] 拉尔森.古代卡尼什:青铜时代安纳托利亚的商业殖民地 [M].史孝文,译.北京:商务印书馆, 2021.
- [40] Veenhof K. Aspects of Old Assyrian Trade and Its

Terminology [M]. Leiden: Brill, 1972.

[41] Durand J-M. Archives Royales de Mari XXVI; Archives Épistolaires de Mari I/1 [M]. Paris: Édition Recherche sur les Civilisations, 1988.

[42] Dodd L S. Strategies for future success:

Remembering the Hittites during the Iron Age [J]. Anatolian Studies, 2007.

[43] Charpin D, Durand J-M. La Prise du Pouvoir par Zimri-Lim [J]. Mari Annales Recherches Interdisciplinaires 4, 1985.

Interactions Among States in Mesopotamia and the Northern Syria Region in the Middle Bronze Age: A Case Study of the Reign of Shamshi-Adad I, Assyrian King

CHEN Yanli

School of Humanities, Ludong University, Yantai 264039, China

Abstract: The Middle Bronze Age was an era when the West Semitic peoples successfully dominated the Fertile Crescent, among whom the Amorites established numerous kingdoms across Mesopotamia and the Northern Syria Region. Against the backdrop of the increasingly complex political situation and the growing prosperity of regional trade in West Asia, these countries fostered a peak era of international activities in ancient West Asia through their interactions. Due to the geopolitical factors, the Assyrian Kingdom under Shamshi-Adad I's rule communicated most closely with the other states in Mesopotamia and the Northern Syria Region at that time. The conflicts and cooperation between the Assyrian Kingdom and the states in the Northern Syria Region, which revolved around politics, military affairs, diplomacy, and trade, have provided a multidimensional perspective for examining the international interactions, geopolitics, and regional trade in West Asia in the Middle Bronze Age.

Key words: Middle Bronze Age; Mesopotamia; Northern Syria Region; Shamshi-Adad I

(责任编辑 雪 簫; 实习编辑 谢天慧)